



张献忠

在四川

社会科学研究 丛刊

K248.1/3

张献忠在四川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00928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

800928

封面设计 魏天禄

张 献 忠 在 四 川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第二期)

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

编辑、出版者

《社会科学研究丛刊》编辑部

发 行 者

四川省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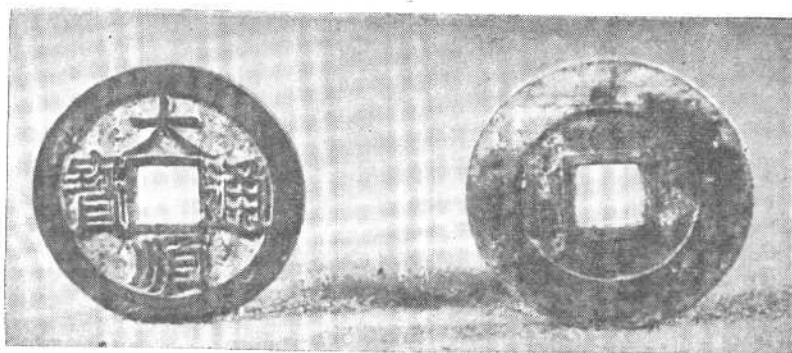
印 刷 者

成都印刷一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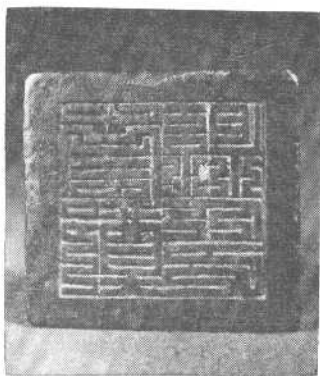
本刊登记号064号

定价:0.89元

张献忠在四川部分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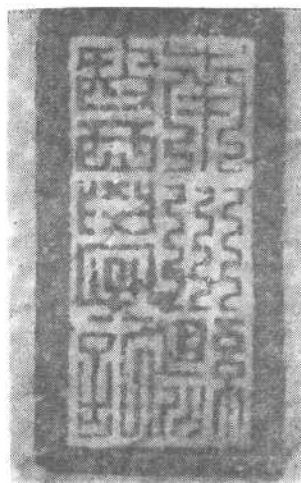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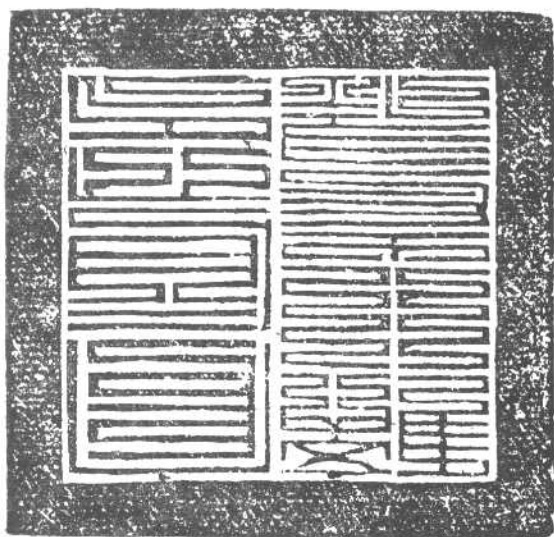
图一 大顺通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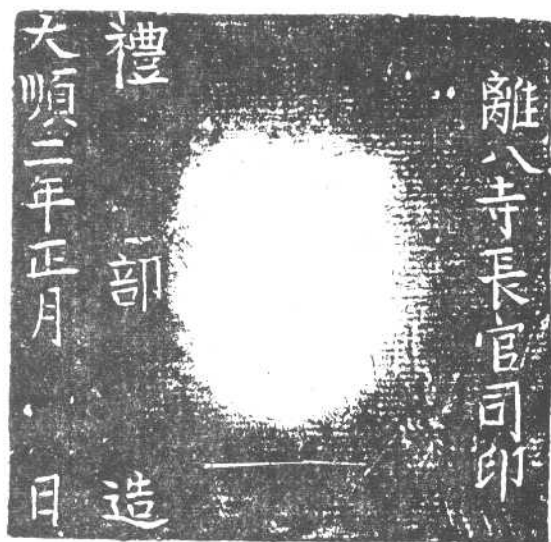
图二 大顺二年南郑县印

图三 大顺二年南川县医学记印





图四 大順二年离八寺长官司印



图五 大順二年离八寺长官司印背面
(中间空白处为印柄)

(四川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供稿)

目 录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综述·····	王家楼	1
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孙次舟	10
对张献忠“屠蜀”应重新予以评价·····	田培栋	49
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	王 纲	61
张献忠“屠蜀”的真相 ——试论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	孙达人	77
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	杨济堃	98
张献忠屠蜀辨·····	任乃强	111
我国杰出的农民革命军事家——张献忠 ——谈谈张献忠与《孙子兵法》·····	孙祚民	136
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	张云侠	153
论明末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农民军的关系 ——兼与方福仁同志商榷·····	袁庭栋	173
张献忠与知识分子·····	顾 诚	188
关于张献忠史料的鉴别·····	任乃强	201
关于张献忠农民起义研究的论文资料索引 一九四九年——一九八〇年六月·····		210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 学术讨论会的情况综述

王家楼

一九八〇年三月三日至三月六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邀集有关的史学工作者和专家，举行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学术讨论会。会上讨论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人”问题的真相，张献忠在明末清初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张献忠失败的原因等三个问题。到会同志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各抒己见，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正确评价张献忠，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到会同志一致指出，过去封建统治阶级把张献忠诬蔑为“杀人狂”、“杀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广且深，特别在四川留下的恶劣影响更不容忽视。至今无论城市、乡村，举凡四十岁以上的四川人，大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解放后，史学界对正确评价张献忠做了许多工作，撰写了一些有见地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但在“四人帮”横行时，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歪曲历史事实，一方面把李自成捧为反孔英雄，完美无缺的农民起义领袖；另一方面却把张献忠诬蔑为叛徒，农民起义队伍中的败类。今天，我们史学界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就应当努力去澄清他们在史学上所制造的混乱，还明末农民起义两大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以本来的历史面目，特别要澄清在张献忠问题上的种种诬蔑和歪曲。

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开得是好的，是粉碎“四人帮”后，也是解放以来史学界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专门学术讨论会，它对进一步开展农民战争史和明史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问题，大家认为，给张献忠加上杀尽四川人民的罪名，这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蓄意捏造和诬蔑，必须大声疾呼，坚决翻案。

过去，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士所制造的什么“屠戮川民，靡有孑遗”，“尽一省而屠之”，以及杀人“六万万有奇”等奇谈怪论，其实，都是不值一驳的。第一，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有政权就要有群众，难道他不知道建立政权要有老百姓而会去杀光吗？第二，当时全国大约才只有六千多万人，而竟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多人，谎言岂不是制造得太拙劣了吗？

诚然，明末清初四川的人口是锐减了，这是历史事实，但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责任不能归之于张献忠。因为：一、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发生在从明朝万历年间到康熙二十几年这段时期内，大约经过了一百年左右，而张献忠在四川的时间只不过两年多。二、张献忠的起义军，只在一段时间内占领过四川的一部分，不及当时四川辖区的三分之一。三、导致四川人口锐减有多种原因，主要是明朝统治阶级与四川少数民族的战争所造成的伤亡破坏；明清官军和四川官僚地主反动武装的烧杀抢掠和对农民军的镇压；清军同明军以及清兵和吴三桂之间的战争在四川造成的烧杀破坏；摇黄十三家农民军与地主武装之间的战争所造成的杀戮；天灾频仍和瘟疫流行。当然，由于进行战争和镇压叛乱，张献忠也杀了四川的一些官僚地主分子、明军官兵和反抗者。

在上述共同认识的前提下，讨论中也提出了下列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起义军纪律严明，是不会乱杀人的。这有大顺二年（1645）三月《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作为有力的证据，碑文规定严禁“扰害地方”，“妄害良民”。再则举新繁、华阳世宦之家的费密、沈荀蔚为例，当时依然过着呼奴使婢的豪华生活，而进士出身的成都令吴继善还作了大西政权的尚书，如此等等，可见对明朝官吏和世宦之家也决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杀一气。所杀的基本上是明王朝在川宗室和顽抗的官僚地主与反动官兵。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政策观点去要求当时的农民革命领袖。张献忠农民军在“杀人”当中难免会有错杀的情况，但这不是一种政策倾向的问题。

再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在四川有“杀人”扩大化的问题。张献忠的起义军入川前本来纪律严明，不事滥杀，所以发展很快，迅速占领了四川。但他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后，特别是清军入关，李自成失败后，矛盾更加复杂化，大西政权成为清军、明军和地主武装攻击的主要目标，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可以说是处于四面楚歌的包围之中，张献忠敌我不分，首从不问，以为“川人负我”，采取了一律镇压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张献忠死后，孙可望、李定国等总结经验教训时，把汪兆麟杀掉，才改变过来。

还有的认为由于粮食奇缺，张献忠的部队也有不得已而杀人充饥的情况。这在历史上也不是罕有的事，不必讳言。

第三种意见认为，张献忠的“除城尽剿”虽然杀人比较多，但正是他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政策。大西政权建立后，地主阶级反动分子极端仇视，纷纷逃往深山，组织反动武装，疯狂地进行反扑。张献忠派军四出进剿，攻破寨堡，玉石俱焚，甚至把被裹胁

当兵的农民，也尽加杀戮。但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要坚持革命，就只能是这样：凡顺从投降的，就加以收容；凡武装反抗或参与反抗的，就予以镇压。所以，张献忠的“除城尽剿”，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不以今天无产阶级的政策尺度去要求当时的农民革命领袖，则正是坚持了农民革命的政策。

另外，鲁迅先生在《晨凉漫记》中谈到张献忠杀人问题时说：“他开始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认为鲁迅先生分析张献忠滥杀的理由是正确的。因为张献忠在外有强大的清军压境，内有明军和地主武装反扑，处于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感到没落绝望，就倒行逆施，大肆屠杀。

二、认为不能以鲁迅先生的那段话为依据，就确认张献忠有过大肆屠杀的行为。根据历史事实，当李自成败退时，张献忠正加紧准备抗击清军，嘱孙可望在自己不幸牺牲后，继承其领导职务，“联明抗清”，“毋为不义”。当张献忠率重兵赴川北抗击清军时，不但没有悲观绝望的表现，相反还流露出了骄傲轻敌的情绪。鲁迅先生的《晨凉漫记》，是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和第五次“围剿”已开始后写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是没落绝望的表现。这是一篇影射性的政治杂文，并非对张献忠“屠蜀”问题的历史专门研究，不应该引来作为对张献忠进行历史评价的根据。

二

关于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不应当扬李抑张，当然也不能扬张抑李。明末农民起义军，

从十三家到最后形成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大部队，一支在北战场，一支在南战场，他们都对推翻明王朝作出了自己的伟大贡献。封建史家所说的“譬如人之死也，献繁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搥其胸，而后闯扼其吭”，正是从反面反映了这种历史的情况。因此，不能说仅仅是李自成领导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而置张献忠于不顾。张献忠从明末农民起义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的领袖。高迎祥为闯王时，张献忠就是八大王。崇祯七年，他们共同主持召开了最著名的荥阳大会，采纳了李自成的正确建议。特别是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重新起义之后，在明末农民起义军中，成为明军的主攻对象，担负着抗击明军主力的任务。他采取“以走制敌”的战略，冲破了明军的“十面罗网”，最后奇袭明军老巢一襄阳成功，执明宗室襄阳王而杀之，致使湖广总督熊文灿解赴北京戮尸，钦命督师辅臣、兵部尚书杨嗣昌在沙市畏罪自杀。此后，明朝再已无人敢言剿了。后来，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余部，特别是李定国，在抗清斗争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于张献忠谷城伪降问题，大家认为，这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农民军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决不因此而加给“叛徒”的罪名。明末统治阶级曾采用剿抚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而农民起义军在暂时转入低潮时，为了对付这种两手政策，保存力量，以图东山再起，曾多次改变硬拚的办法，将计就计，不仅张献忠，其他如高迎祥、李自成、罗汝才等都曾经伪降过。谷城伪降后，张献忠一不交兵，二不听调，三不整编遣散，只是领取部分军需和给养，赢得了充分的休整时间。然后振臂一呼，率众杀出谷城，一举消灭明军主力，求得了自身的大发展。各地农民军闻风响应，风起云涌，再次掀起了农民战争的高潮，终于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事实证明，经过谷城伪降，最后是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的。

在肯定李自成、张献忠同是明末农民起义两位重要领袖的共

同认识基础上，对以下几个问题，会上也提出了互不相同的看法。

关于李、张的历史评价，有的同志认为，应一视同仁，不分轩輊；较多同志认为，李自成攻下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对全局影响很大。因此，明末农民革命领袖应首推李自成，次则张献忠，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个人的品德和才能方面，有的同志强调李自成的优点；有的强调张献忠的优点；多数同志认为，二人各有短长，各有千秋，不能简单地断言此优彼劣。例如在广行仁义，收拾民心，安抚群众方面，张献忠不如李自成。而在军事上李自成不如张献忠。川东玛瑙山、柯家坪、土地岭、黄陵城等战役中，张献忠打得十分出色，特别是运用“以走制敌”的战术，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戈东下，攻取了襄阳，迫使杨嗣昌畏罪自杀的战绩，更充分显示了张献忠的军事天才，较之我国历史上任何著名战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李自成比较注意保护生产，有“马腾田苗者斩”的禁令，似优于张献忠。另一方面张献忠顾全大局，从不搞火并，很值得称道。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危急时，他加以团结和扶持。李自成暂时遭到失败时，他积极帮助。在这一点上，李自成不如张献忠。

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后期李、张交恶，矛盾激化的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农民革命领袖受皇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即使往日同是阶级弟兄，当彼此都各自称帝以后，在“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思想支配下，互不相容，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必然发展的趋势。有的同志着重指出，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相继杀掉革里眼、左金王、罗汝才和袁时中，自称“新顺王”，他对武昌建号称王的张献忠极为不满，派人致书加以威胁。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下北京后，就给张献忠传檄下令，以致激起张献忠的极端愤慨，说李自成“今一旦妄自尊大，传檄辱我，吾两雄无并立之势”。致使两

人的关系极度恶化。另一方面，有的同志又着重指出，崇祯十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双方在川北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以来，张献忠把李自成看作主要敌人，不集中主要力量去对付王应熊、杨展、曾英等地主武装，反把重兵摆在川北战场，这是张献忠的失策和错误。

三

关于张献忠失败的原因，多数同志认为，要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去进行探讨，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研究中，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在理论与历史实际的结合上，在共性与特性的具体联系上，来把问题弄清楚。

至于张献忠失败的直接的主要原因，则各人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失败，主要是由于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清军入关后，国内阶级关系急剧改变，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当时，存在着农民军、清军、明军和地主武装等四种武装力量。明军和地主武装是结为一体的，而清军又联合了北方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力量，在这种形势面前，单靠农民军的力量两面开弓是无法取得胜利的。本来明军和地主武装是与清军对抗的力量，特别是四川的地主和北方的地主不同，他们受到打击不多，还有相当的实力基础，抗清意志较为坚决。至于人民群众就更不用说了。但张献忠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联合一切抗清力量，共同对付清军，反而处于四面受敌、内外交困的地位，致使清军各别击破，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再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的“流寇主义”是导致失败的主要

原因。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十多年来，一直流动作战于秦、晋、楚、豫、赣、皖、川等省，虽曾占领过不少城市和地方，但都是“掠城、劫库、放囚、赈饥”后，旋即撤出，没有建立过根据地。这样，就使起义军经常处于人困马乏的境地，得不到应有的休整和补充，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这种情况，也是迫使张献忠要在谷城伪降的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由于“流寇主义”思想，当他在武昌和成都建立政权后，也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反而造成粮食奇缺，生活条件无法保障的情况。所以，张献忠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坚持农民革命的方向和政策，而这种农民革命的方向和政策，既体现了农民的革命性的一面，也体现了农民的局限性一面。农民革命，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但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因此，作为农民革命领袖而言，最终或者坚持农民革命一套政策、措施而以失败告终，或者改弦易辙转化为封建新王朝的皇帝。二者必居其一。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政权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其农民的革命性和局限性都表现得较为充分，分析研究这样的典型历史环境，对探讨农民革命问题，具有典型的意义。张献忠在四川坚持农民革命的一套政策、措施，必然要遭到地主阶级的顽强反抗。对此，张献忠毫不妥协，采取“除城尽剿”的方式，坚决予以镇压。但是，在攻破堡寨后，却不分首恶和胁从，杀戮过多。另一方面，土地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生产和生活无法保障，一些农民宁愿进入地主武装的堡寨，以谋暂时的生计。这样，“除城尽剿”越剿反抗的人反而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必然要导致最后的失败。

有的同志指出，起义前期，张献忠和李自成互相配合和支援，就取得胜利；后期双方交恶，甚至兵戎相见，就被敌人各个击破，还有的同志指出，张献忠在川北抗清时，拥兵五、六十万，但他

骄傲轻敌，以致受到突然袭击，不但自己牺牲了，部队也遭受到重大的损失。

到会同志一致强调指出，对张献忠其人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历史，特别是对“张献忠在四川”的问题，应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进一步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有关记载张献忠事迹的书籍和史料，要加以鉴别和分析，区分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资料，甚至是道听途说以至凭空捏造，以便做到去伪存真，心中有数。对现存的有关张献忠的孤本书籍以及碑文、文物等，应加强调查和搜集工作，勿使散失。大家还强烈呼吁有关单位加强领导，筹组成立“张献忠研究会”，以便更好地交流研究成果，进一步搞好关于张献忠的研究工作。

张献忠在蜀事迹考察

孙次舟

张献忠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进入四川，下夔州。六月，破涪州，取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建大西国。到清顺治三年底（1646），归于失败。张献忠统治四川的时间，不到三年。在这短短的二、三年中，张献忠在四川和明军及地主叛乱武装曾经进行过一些战争。叛乱的地主，多被张献忠所消灭，明军也多数被打垮了。农民起义军，向地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没有丝毫可以非议的。但自清以来却流传着张献忠“屠蜀”的一种谣言，说张献忠“嗜杀自天性”，“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蜀碧》卷三，《绥寇纪略》卷十），“发兵四出，搜各州县山野，不论老幼男女，逢人便杀”（《客滇述》），制造出张献忠“疯狂”滥杀的种种故事。我们考察了张献忠一生革命斗争的历史和张献忠的真正为人，感到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传述的张献忠“屠蜀”故事，完全不是历史真实，而是有意捏造的一些诬蔑之言。

清军被明朝总兵吴三桂导引进入山海关后，在清军面前摆着三个敌对政权：一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一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再就是江南的南明政权。清军如果不能打败这三个独立政权，要想在中国建立满洲贵族的统治，便不可能。清军首先打败李自成，接着又渡过大江，摧毁明朝的南京政权。第三步便是向四川进军，攻打张献忠。由于张献忠顽强地抗击清军，清军曾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而在张献忠死后，他的部属又和南明桂王政权相结合，为了保卫西南，反抗民族征服，和清军进行了十五、六年的剧烈战斗。直到康熙初年，清军对四川的军事征服，才算初步停止。可是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年（1674—1681），在这七年中，清军又和吴三桂部属展开争夺四川地盘的长期战争。到这时，四川人民的确被摧残殆尽！明万历六年（1578），四川省“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会要》卷五十）。这个人口数字仅是明官方“赋役黄册”登记的纳粮户，而大量的荫户、漏户以及逃亡人口，并未包括在内。核其实际人口，应比这个数字增加一倍或二倍。但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通省之户口，总计仍不过一万八千九十余丁”（嘉庆《四川通志》引何源濬《条议》，但妇孺未计算在内）。原先有着数百万人口或近千万人口的四川，这时却成为“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何源濬《条议》）的荒凉区域。四川人民不是被屠杀光了，又往哪里去了呢？

问题就在这里。屠杀四川人民的，应如清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所说，是张献忠“滥杀”的结果呢？还是另有罪魁祸首？清军在顺治三年（1646）据说已“斩”张献忠于“西充”，为什么经过近四十年的“招徕”“生息”，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川还仅有一万八千多男丁呢？在这里，我打算对当年“屠蜀”的真象，作一番严肃的考察。

一、《明史·张献忠传》的诬妄

清朝在征服中国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很早就懂得文化统治的重要性。清朝为了防止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反攻，进逼南京之威胁的再度发生，因此制定了“迁海”、“告